

中国南北朝 佛教研究

主
编

张风雷
金天鹤
竹村牧男
(日) (韩)

ZHONGGUO
NANBEICHAO
FOJIAO YANJIU



宗教文化出版社

中国南北朝 佛教研究

主
编

张风雷

金天鹤

(韩)

竹村牧男

(日)

ZHONGGUO
NANBEICHAO
FOJIAO YANJIU



宗教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南北朝佛教研究/张风雷,(韩)金天鹤,(日)竹村牧男主编.——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4.4

ISBN 978-7-80254-848-0

I. ①中…II. ①张…②金…③竹…III. ①佛教史-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学术会议-文集IV. ①B949.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79536号

中国南北朝佛教研究

张风雷 [韩]金天鹤 [日]竹村牧男 主编

出版发行: 宗教文化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后海北沿44号 (100009)

电 话: 64095215(发行部) 15801626138(编辑部)

责任编辑: 霍克功

版式设计: 陶 静

印 刷: 北京柯蓝博泰印务有限公司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版本记录: 880×1230毫米 32开本 9印张 250千字

2014年5月第1版 2014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54-848-0

定 价: 35.00元

目 录 | CONTENTS

关于南北朝佛教研究的展望及其课题	[韩]郑柄朝(1)
关于法上《十地论义疏》“加分”释的三种尽 ...	[韩]金天鹤(16)
对金天鹤论文的评议	王 颂(36)
吉藏教学与真谛三藏	[日]奥野光贤(48)
对奥野光贤论文的评议	圣 凯(76)
光宅寺法云的《法华经》观	[日]菅野博史(78)
对菅野博史论文的评议	徐文明(102)
“国主即是当今如来”发隐	张雪松(104)
对张雪松论文的评议	[韩]池田将则(134)
龙门北朝隋唐造像铭所见之净土信仰的 转变	[日]仓本尚德(140)
对仓本尚德论文的评议	李 翎(175)
涅槃师的佛性义探究 ——以《大般涅槃经集解》为中心	[韩]河由真(178)
对河由真论文的评议	刘成有(203)
净影寺慧远的三佛性与二种性	[日]冈本一平(206)

对冈本一平论文的评议	周 齐(238)
“种姓无为论”起源考	
——以《宝性论》和《佛性论》中“gotra”翻译实例	
为中心	[韩]金成哲(241)
对金成哲论文的评议	周贵华(265)
镜中花——《求那跋摩传》再检讨	宣 方(269)
对宣方论文的评议	[韩]石吉岩(279)
附录:第二届中日韩佛教学术大会议程	(283)

关于南北朝佛教研究的展望及其课题

郑柄朝

韩国金刚大学校长

1. 序言

中国人民大学、日本东洋大学、韩国金刚大学共同进行着一个 10 年研究计划,其课题题目是“佛教在东亚的受容与变容”。这一研究计划不仅是为了深化该领域的研究,同时也期待着能够进一步推进整个佛教学的研究。作为第一次的联合研究与讨论,去年在韩国以“东亚的佛性·如来藏思想的受容与变容”为主题进行了一次学术会议。今年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的学术会议其主题是“南北朝时期的佛教思想”。作为一个要持续 10 年的大课题,将来的大部分研究应该会采取如下的形式,即以南北朝时期的研究为中心的同时,展望隋唐时代的佛教与 7、8 世纪东亚佛教思想的变迁。

作为一篇主题演讲,与其讨论该领域的一些具体问题,不如以更为宏观的角度谈一谈关于“南北朝时期为中心的佛教的受容与变容”的一些问题。虽然本人不是该领域的专业研究人员,但是通过

留意我们学校佛教文化研究所的课题研究,也获得了一些感想。

在南北朝时期的佛教研究领域,能够称之为古典的研究成果可以说屈指可数。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1938)和许理和(E. Zürcher)的《佛教征服中国》(*The Buddhist Conquest of China*)(1959)不仅是这一领域里的先驱性的著作,而且也是这方面研究基石性的巨著。之后还有陈观胜(Kenneth Ch'en)的《佛教的中国转型》(*The Chinese Transformation of Buddhism*)(1973),当然也不能漏掉1980年以后整合了日本学界与中国学界研究成果的镰田茂雄的《中国佛教史》系列。

上述的这些研究成果对于该领域的研究者来说,既是古典著作也是研究的起点。事实上中国的思想观点或文化特殊性其种类可以与数量庞大的佛典相媲美。由于其重叠性和多样性不可能用一句话来概括。至于地域的广袤性更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在中国特别是在南北朝时期的中国,不用说汉族,以西北少数民族为首的四方异族也是中国历史与文化的重要组成因素。这与基本上以汉族为中心的中国历代王朝形成鲜明的对比。再加上中国广袤的地理因素,在当时多种文化与思想只能混杂在一起。多种文化与思想再加上不同民族的介入,使得当时的生活方式、文化轨迹等等也只能是一种复合式的。在这样的文化多重性当中,最为突出的两个线索就是中国固有文化与以佛教为代表的印度文化。多种民族与文化、广袤的地理环境,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传统文化与佛教所代表的印度文化也在不停地兴衰沉浮,因此就南北朝时期而言,中国传统文化也好,佛教文化也罢,都不能将其看做是一贯的体系

去进行理解。即只有考虑到其多种可能性的前提下,才有可能真正认知南北朝时期或者南北朝时期的佛教思想。

带着上述的问题意识,让我们首先简单回顾一下最近二三十年来值得关注的研究动向,然后在此基础上再提出几点建议。

2. 关于南北朝佛教研究的最新动向

在这里首先分别看一下三个大学之所以能进行联合研究的一些契机。换句话说就是各个大学佛教文化研究所的学者们以往的研究及其成果。这些研究及其成果不仅是将来要关注的对象,而且这些研究及其成果对于三个大学的联合研究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范例,而且对于未来的研究方向也是一个很好的参考。在提出本人的一些见解之前,先让我们看一下这些以往的研究及其成果。

1) 日本京都大学的“北朝后半期佛教思想史”及“真谛三藏及其时代”的联合研究

这两个课题主要是由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研究。这两个课题都是以南北朝后半期作为其时代背景,只是前者研究的是北朝,而后者研究的是南朝后半期的真谛三藏及其周边的课题。研究成果主要有荒牧典俊的《北朝隋唐中国佛教思想史》(法藏馆,2000)、船山彻的《真谛三藏研究论集》(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2012)。

前者的中心内容在序章北朝后半期佛教思想史序说与第一章从南朝佛教思想到北朝佛教思想当中,主要探讨的是地论思想。

而且作为其周边的课题同时也涉猎了北朝佛教时代的石窟寺院与中国传统思想的问题、作为南北朝后半期佛教思想前提的《成实论》的问题及关于隋唐佛教思想的问题。

后者则是集中调查研究了同时期在南朝活跃着的译经三藏真谛及其著作、思想等等,可以说是以真谛为中心的摄论学研究。

这是该领域的主要研究者们集体研究的成果,而且在其出发点上敦煌写本应该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当然除了敦煌写本之外,与现存的真谛译经论之间的比较研究应该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总体来看两者都是对于敦煌写本的文献学及思想方面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研究了周边的相关问题。以佛典翻译态度为基础的文献学研究与中国石窟寺院为中心的本土化研究等等,都可以说进一步推进了以往的研究。只是缺少从南北朝时期到隋唐时代思想转向过程的研究,对于这一点感到相当遗憾。

2) 中国的藏外佛典文献出版事业

中国的方广鋈先生所主导的这项出版事业,是全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是校勘敦煌出土的佛教文献,并收集相关的研究论文进行出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已经超过了15辑,而且正在陆续出版当中。

其分类主要有梵文典籍新译、汉译藏文佛典、南传佛典、佚典遗珠(原本佚失又重新发掘的佛典)、佛典异本、敦煌禅籍、佛教忏仪、三藏论疏、三阶教资料、阿叱力教典籍(云南地区瑜伽密宗典籍)、敦煌经录、西夏佚典、石刻资料、疑伪经等等和与此相关的一些研究论文。其涉及的领域及时代相当广泛,而其中最多的还是

敦煌遗珍。众所周知敦煌遗珍当中包括了大量的南北朝及隋唐时代的崭新的佛教文献。

只是由于文献资料所涉及的时代及思想范畴太广,因此不太容易集中使用。但是作为南北朝与隋唐佛教研究的文献学基础,这项出版事业的重要性是不可忽视的。

除此之外,1980年代开始敦煌学研究在中国各地逐渐兴起,敦煌学特别是对于敦煌宝藏的研究必然会成为南北朝佛教研究的基石。以往的敦煌文献研究主要是以发掘新资料为主,但是未来的研究还是需要以内容分析基础上的客观理解为主。特别是初期的敦煌文献研究主要是集中在禅宗相关的文献当中,而值得鼓舞的是以后的研究将会同时研究各个宗派的相关内容。

3) 金刚大学的地论宗研究与藏外文献出版事业

金刚大学佛教文化研究所从2007年开始主要是研究“佛教的中国式(或东亚式)变容”问题,这是人文韩国(HK)课题的一个子课题。这一课题主要是研究中国在接受印度大乘佛教典籍的过程中所产生的翻译及受容、变容等问题。在研究受容、变容等问题的时候有很多种研究方法,其中主要的方法之一就是文献学的研究。

但是,单纯地比较同一佛典的梵文本(或藏译本)与汉译本的方式来研究中国式受容与变容是有其局限性的。而南北朝时期的佛教思想是印度大乘佛教与隋唐时代的中国化宗派佛教之间的重要的转折点,因此把研究重点放在了南北朝时期的佛教思想当中。而作为此项研究的第一个研究成果就是《地论思想的形成与变容》(金刚大学佛教文化研究所,2010)与《藏外地论宗文献集成》

(同上,2011)。之后还将继续出版《藏外地论宗文献集成》续集与《藏外摄论宗文献集成》。

此项工作基本上也可以说是,以敦煌出土文献为基础的南北朝后半期佛教思想史研究。与其他的佛教学派研究相比,以往的地论宗研究可以说是相当薄弱的,因此通过此项研究可以逐渐完善佛教各个学派的客观集成。

4) 中国人民大学、日本东洋大学、韩国金刚大学关于“佛教在东亚的变容”研究

最后将要介绍的是本次学术会议。这样的学术会议初步计划是将持续 10 年左右,在此过程中不仅会有相关领域学者间的互相交换,而且中日韩三国还可以共享该领域的研究成果。虽然此项研究是围绕着三个大学进行,但是这种会议也将会成为各国的相关学者们共享研究成果的重要场所。中国佛教协会的已故会长赵朴初曾经用“佛教的黄金纽带”来形容中日韩三国的关系,因为佛教可以说是东亚三国历史的公分母。所以在这里举行的“学术研讨”也可以说是超越了既往的友好、先进的阶段,而寻求三国未来发展方向的一种非常适宜的尝试。

在“佛教在东亚的变容”这一大主题之下,具体地还细分为 10 个小主题,并通过这些小主题包含和共享相关的研究成果。重要的是在共享相关研究成果的时候,应该可以弥补和完善各国学者间存在着的些许深度及视野方面的局限性。去年在韩国举行了“东亚的佛性·如来藏思想的受用与变容”为主题的学术会议,并通过此学术会议达成了共享研究成果的目的。在这里将要举行的

是以“南北朝时期的佛教思想”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议。

3. 对于扩张视野的几个提案

前面根据本人的观点,分别介绍了南北朝佛教研究方面值得注意的最新动向。这些研究的最大特点是除了极少数之外其他都是佛教文献与佛教思想史方面的研究。如果把佛教仅仅看做是单纯的教义体系、思想体系的话,那么这些研究可以称得上是非常有效的。但是,众所周知佛教特别是南北朝时期的佛教不仅是一种宗教现象,同时也是一种文化现象、社会现象。换句话说这是包含了思想、信仰、经济、政治、民族等各种现象的一种复合式的文化现象。另外还有作为佛典用语的梵语和胡语、书面体汉文和口语体汉文等各种语言问题,还有处在佛教传播路径上的西域、东南亚等地方的地区佛教问题,这些都是不可忽视的并且是亟待解决的问题。特别是与王室或者教团的主要事迹相比,普通民众所认同、信仰的大众佛教思想等问题更需要进一步的研究。虽然并不能像统治阶层那样成熟而完善地受容佛教,但是他们的这种现实利益层面上的佛教观也是很有必要进行研究。从哲学的观点来表述的话那就是“那些抱有崇高理想的上层佛教人物为了高扬下层民众的佛教观而做了‘哪些’努力”。这些都是需要研究的问题。

考虑到以上的这些问题,同时也是为了能够让这项研究更加成功,本人认为三个国家的三个大学在进行研究活动的时候,希望能更进一步扩展研究的范畴。

1) 加强文献学研究方面的协作

对于南北朝佛教研究而言最为基础的资料应该还是那些最原始的记录资料。特别是敦煌宝藏当中的佛典相关的资料,这些资料除了极少数之外应该都是可以接触到的。除此之外包括石刻资料在内的为数不少的记录资料也已经有人收集并公开发表,可以说在材料方面已经可以称得上非常丰富。之所以说丰富是因为那些已经公开的资料当中大部分都还处于未研究的状态当中,同时也意味着即便是已经公开了的资料,但是很少有学者对其进行研究。虽然这样的状况正在逐渐改善当中,但是看起来很难在短时间内有所成效。所以很有必要建立新的协作方式来改善这样的状况。

金刚大学佛教文化研究所出版的《地论思想的形成与变容》和《藏外地论宗文献集成》就是我们在探索新的协作方式过程中所产出的有所改善的两个成果。这两个成果是中日韩三国的学者们一起参与和研究的结果。前者收录的是关于地论宗思想的最新研究动向与思想方面的一些探索,即此书可以作为地论宗研究相关的文献与资料,还可以作为进一步的思想研究的起点。此书已出版了韩文版与日文版。后者则主要是集成了敦煌出土文献当中的与地论宗相关的原始资料,并对文献进行了中文、日文、汉文注解。作为更为完善的资料集,此书应该可以让包括中日韩学者在内的各国的地论宗研究者们更方便地进行研究。

举例来说方广錩先生主编的《藏外佛典文献》,三个国家的专业学者们也可以共同合作并按各个主题类别重新对其进行编辑,使其更具有内容性,且更容易地对其进行研究。在这里不一定非

得是三个国家学者们的共同研究才可以,而是任何的对其进行分类并减少研究难度的工作都可以称得上是对于这项研究的一大贡献。

2) 引入社会思想史研究的必要性

一般来说历史学家、哲学家、宗教学家其视角是大不相同的。特别是对于社会、思想、信仰方面都非常混乱的南北朝时期而言,则更是如此。

但是,非常遗憾的是现在几乎所有研究南北朝佛教的学者们大部分只关心佛教内典。文献学研究的确是非常有必要,但是这并不是佛教研究的全部。所以非常有必要建立一个可以提供最新学术动向的综合性的研究服务系统。即应该用更为宽广的视野来研究南北朝时期的佛教,虽然现在的各项条件比以前好了很多,但是如今的学者们与序言中所介绍的几位学者们相比而言,其视野反而变窄了。

在这里有必要确认一点,那就是与印度佛教不同,东亚社会里的佛教是存在于社会体制当中的。佛教传入中国的时候最大的障碍是其所具有的出世间的形态,由此中国佛教当中就产生了忠孝、护国护法、自主劳动等思想特性。这样的本土化努力在佛教初传时期就已经开始了,到了南北朝时期则基本完成。从佛教教团史的观点来看,南北朝时期正处于从印度佛教转向中国佛教的转型期。而且这样的外在转变因素必然会对思想也带来一定的影响。与此同时包括佛教上层精英在内,构成其基础的大众阶层的信仰形态的变迁与社会变动之间也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应该说这样

的大众阶层的信仰形态对于当时的社会变动来说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但是至今都非常缺乏这方面的研究。

2007年出版的许理和(E. Zürcher)《佛教征服中国》(*The Buddhist Conquest of China*)第三版当中,太史文(Stephen F. Teiser)认为1998年由李四龙与裴勇翻译此书以来,对于中国学界的南北朝时期的研究,特别是对于方法论的研究方面带来了很有意义的变化。虽然这是一家之言,但也指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这是对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中的南北朝时期的心学研究或佛教思想研究的一种反动。换句话说在研究“南北朝佛教思想的受容与变容”的时候要当时的信仰集团或寺院集团,还有那些接受佛教思想并又产生新的佛教思想的佛教教团进行社会思想史方面的研究。

最近在中国出版的尚永琪《3-6世纪佛教传播背景下的北方社会群体研究》(2008)、何方耀《晋唐时期南海求法高僧群体研究》(2008)等一系列研究成果,就是从社会思想史的立场上研究南北朝佛教的新的研究成果。这样的研究成果可以为未来的思想史研究提供重要的线索。

3) 地理性视野的深化与扩张:印度、西域与中南半岛

下面所要谈论的是地理性视野的问题。说是地理性视野,但是其中也包括了环境、民族、文化等问题。简而言之我们在研究南北朝佛教的时候可能太执着于江南与江北之间的差异性。南北朝时期的佛教虽然在狭义上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地区的问题,但是从广义上来说则必然是以从印度开始到中国为止的多种多样的地理性因素作为其背景。

首先以印度为例,慧超在《往五天竺国传》中提到的“天竺”并不仅仅指现在的印度与巴基斯坦,其地理范围应该更为广阔。即它不仅包括了丝绸之路沿线的月支国(现今的乌兹别克斯坦及哈萨克斯坦),还包括了巴米扬及开伯尔峡谷一带(阿富汗)等等的更为广阔的地区。如果把9世纪初的人们的地理性视野作为参照物,那么对于南北朝时期的佛教人物而言,其地理性视野与此相比差别应该不是很大。即便是把范围缩小为现今的印度与巴基斯坦或“佛教的印度”,也不能用“单一的几个佛教传统”来说明其中存在着的人文地理方面的多样性。尽管如此我们在研究作为起点的印度佛教的时候,还是存在着过于简单化的倾向,而且在思想、文化方面也是如此。可以说能够确定为“是这样”的东西反而是极为稀少的。

接着是南北朝时期的问题,南北朝时期的佛教传播路线有陆路与海路。陆路一般指的是西域,而海路指的是东南亚地区。关于这两个地区的南北朝时期的记载,如果排除掉中国方面的记录,那么可以说寥寥无几。而且即便是中国方面的记载,其实也不是很多。可是在研究“南北朝佛教的受容与变容”问题的时候直接跳过这两个地区的佛教而只是单纯地与印度进行对比的话,这样的研究方式应该是非常不妥当的。因此,即便这两个地区的佛教在性质、内容等方面还有很多模糊的地方,但是对于研究南北朝佛教或“佛教在东亚的受容”问题的学者们而言,必须要考虑到这两个地区的佛教。

关于印度佛教我们有很多相关的原始资料,其中具有思想、文

化特点的与印度佛教相关的地理材料大部分都是汉译材料。通过文化、思想、地理等因素而研究这些汉译原始资料的时候,首先要追溯这些汉译资料的各种异译本之间的异同及资料当中所包含的思想的源流等问题,从而对于印度佛教的文化、思想等状况进行一定的了解,然后才可以研究“受容与变容”问题。

即研究“南北朝佛教的变容”问题的时候,如果采用这样的研究方法应该可以大大减少过于简单化印度佛教而引起的各种错误。由于语言的差异性,汉译佛典当中必然会存在着一些误译问题,但是不可忽视的是这些误译问题大部分是由于印度佛教当中所包含着的时代、地理、文化、思想等层面的差异性而导致的。

特别是对于西域和东南亚地区的佛教而言,相关的资料都是通过为数不多的遗迹、遗物和对于求法僧或从天竺、西域而来的“来华僧”相关的零星记载当中获得的。但是这些地区的佛教对于南北朝佛教而言,或者是作为前中国佛教阶段而言其重要性可以与印度佛教相媲美。因为佛典解释当中的一些特定案例或者是佛教的文化变容当中的一些特定因素都与这些地区的佛教有着密切的联系。例如南北朝佛教特别是其中的北朝佛教就与西域佛教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可知在研究南北朝佛教的时候,不管是社会史方面还是思想史方面一定要了解西域佛教,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同时这也是下面所要探讨的之所以要借鉴文化史研究成果的理由之一。

4) 文献、思想研究与宗教、文化史研究的融合

最后将要探讨的是关于宗教、文化史方面研究的必要性问题。